

## 好看的「歷史」

### ——讀茅海建《苦命天子——咸豐皇帝奕訢》

◎ 黃 勇

茅海建：《苦命天子——咸豐皇帝奕訢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

第一次得知茅海建先生的大名，是在數年前的大學課堂上，學識淵博的歷史系老先生的大力推薦。從此知道了茅先生的大著如《天朝的崩潰——鴉片戰爭再研究》（三聯書店，1995）和《近代的尺度——兩次鴉片戰爭的軍事與外交》（上海三聯書店，1998）。近來所讀的一本茅先生的著作《苦命天子——咸豐皇帝奕訢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，卻更讓我陶醉其中。

《苦命天子》是一部用通俗筆法寫就的歷史著作，但其史學價值並不因此而稍減，作品展現了作者對近代史的一貫思索和研究。楊奎松先生就說過該書「其通俗性不亞於讀一部歷史小說，其學術性更不亞於他的其他歷史學專著」。作者自己也坦言是抱著寫一部「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學術著作」的初衷，以期「條理自己的思想」，像拼貼畫一般，「敞開來說說，讀者也不妨隨便看看」（導言）。

這是一部帝王傳記。作者將其還原為「人」，一個普通平常的青年，「只因為登上了絕大多數人都夢求的皇位，結果送掉了性命」。從理論上來說，皇帝擁有「天下」的一切，但他並不能享有其中的很多樂趣，甚至還反倒是一件苦差事，只因他身上擔負著「天子」的責任。倘若在一個和平的年代，還不難敷衍上一輩子，可是他遇到的是清朝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災難，這無可避免地註定了咸豐的「苦命」。

從1850到1861年，咸豐在位十一年，具體講是「4184天」。「沒有過一天安生的日子」。席捲半個中國，持續十幾年的太平天國戰爭，1856年至1860年爆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，再加上此期間天地會、捻軍等起義造反，內憂外患，遍地硝煙，使得咸豐如坐針氈，忙得不可開交。到了太平天國北伐軍隊打到河北、山東的時候，咸豐只求「苟安」了。英法聯軍進逼北京之前，他已經變得神經兮兮，狼狽逃奔熱河，至死也未敢再回京城。甚至於「他死的時候，天下局勢仍然大亂」（第343頁）。應該說，咸豐本人不無努力過，可惜他用過的挽救危局的千方百計，換來的只是千姿百態的憂慮，「看不到一線生機，找不到一條生路」（第343頁）。作者用十分細膩的筆法，近距離地再現了咸豐皇帝奕訢的悲劇一生。

一路讀來，近代史上的一些謎團，豁然開解。如圍剿太平軍的過程中，咸豐頻頻調兵換將，甚至傾盡家底，但因為換湯不換藥，導致局勢每況愈下，最後不可收拾。「屢戰屢敗」而顯出「朝中無人」的窘境，讓咸豐深感困惑。作者于此點出，咸豐年代「社會動亂的根源之

一，在於乾隆末年起半個多世紀的政治腐敗」。腐敗已經使得「絕大多數的官員已經不能在政治目標上與朝廷中樞保持一致」（第85頁）。腐敗、落後陳舊的政體在重大的危機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不堪，不僅是上下級之間的管道不通，更是下級官員的陽奉陰違，敷衍塞責所致。咸豐百思不得其解，即便是兩次下「罪己詔」也絲毫不起作用。慢慢地，「勤政的咸豐帝，此時愁腸百轉，漸漸地倦怠於政務了……」（第86頁）

作者在敘述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，向我們展現了咸豐與曾國藩之間的「鬥法」，並且解釋了由於清廷的財政危機，由此催生「厘金」產生的原因。對於此，作者認為「厘金和湘軍開始了晚清中央權輕、地方權重的新格局，原來的統治秩序從內部開始了變異」（第132頁）。

清廷上下在應對外交時所表現出驚人的迂腐僵化、傲慢無知。他們不知道時代已經巨變，仍然用舊的、過時的，更是不合時宜的觀念來看待外部世界，與外國人打交道。對於所謂「華」、「夷」之間「禮」的可笑堅守，咸豐帝所關注、所堅守的「國家利益」，「與近代世界的看法，完全不能吻合」（第212頁）。對於國際形勢、外交慣例——甚至是英語——的茫然無知：「若大個北京城，清朝找不出一個懂英文的人。」（第234頁）……一切一切，使得我方在既不知己，更不知彼的情境下，一次次錯失良機，迭出混招，以至割地賠款，令人磋歎不已。

書的最後講到了咸豐駕崩前後，圍繞最高權力而進行的驚心動魄爭鬥，結果自然是那拉氏慈禧成了「笑到最後的人」。從今天的時代來觀察咸豐，作者給了這麼一句相當精當、精彩的評語：「他直身躺在時代的分界線上，手和腳都已經進入了新時代，但指揮手腳的頭腦卻留在舊時代。」（第342—343頁）但因為他是統領全國的「天子」，這一缺陷，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，而是當時整個中國的悲劇。在這個意義上講，苦命的天子是與苦命的中國就緊密聯繫在一起了。

如是種種，著者娓娓道來，讀者難得不為之動容。《苦命天子》通過對一個身處其中苦苦掙扎，內心備受煎熬的平庸皇帝的描繪，讓我們感同身受那個內外交困、危機重重的年代。難得的是，在敘述的過程中，作者不失時機地插入自己不無創見的精闢思考和經驗總結。以「敘」為主，「議」為輔，「敘」與「議」的協調交織，既保證了行文的流暢，同時不失思想的深度。

《苦命天子》讓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漢學大師史景遷先生，以及他用生動的文藝筆法寫成的歷史人物傳記的《康熙自畫像》一書，以一個男人的「內心獨白」的方式，去記錄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其一生中所經歷過的歡樂與痛苦。「在描述人物與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說式的感覺」。在國際漢學界，史景遷先生正是以他將歷史內容和寫作技巧完美結合的實踐，備受推崇。此外，唐德剛先生的《晚清七十年》也是憑藉其生動的敘事，而風靡兩岸三地。黎東方先生所開創的「細說歷史」體例，其可讀性也是不逞多讓。茅著在「好看」方向上的努力，與史著、唐著和黎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一種新寫作方式的嘗試，要麼暴得大名，要麼默默無聞。《苦命天子》更接近後者。不是說沒人知道，而是反應平淡，應者寥寥。這一點，恰與影視界氾濫成災的惡俗宮廷劇、「戲說」歷史劇等形成了鮮明對照，讓人唏噓。我們不難想像，咸豐皇帝如果出現在該類劇作中，將是一個遠離國事困擾，安逸地享受宮廷的奢華生活，整天忙著應付後宮嬪妃爭風吃醋的天子形象。我們的歷史劇編劇所受的歷史學教育、歷史水準且不說，他們關心的只是收視率的高低，因此重點在於投觀眾所好，就肆無忌憚地生編亂造。觀眾的審美趣味一旦被培養、固定起來，也就認定了這一種述說歷史的方式。這樣一來，兩者便形成了一種「共謀」

的關係，由此產生的惡性循環便愈演愈烈了。

《苦命天子》的所遭受的冷場，因此更應該引起學界的關注：歷史研究是繼續局限在狹小的學術圈子裏頭，還是更應該讓「歷史」變得通俗起來，讓更多的觀眾（特別是青少年）瞭解一點「真實」的歷史知識，樹立一種相對「正確」的歷史觀念。而不是被胡編亂造的「戲說」潮牽著鼻子走。通俗並不是媚俗，而是指著作的可讀性，要生動、好看，既擯棄了多數專著的艱深晦澀，又自覺地遠離低級和媚俗。正如茅先生在書的「後記」裏所提到的此類「好書」的基本標準：「好書應當是能夠給專家以啟發、讓普通讀者愛看的精品。」

在普及方面，影視界已經走在前頭，如近期電視媒體所主辦的《百家講壇》欄目，選擇一些普通觀眾所感興趣的話題，請該領域知名專家開講座，普及知識，拓展視野。獲得了相當好的社會效應。同時，高收視率也給電視台帶來了豐厚的回報。這一點是值得出版界的人士借鑒的。

由此說來，歷史工作者的擔子可謂不輕。好在《苦命天子》十年前就已經先行一步作出了表率，「後來者」也應該快步跟上才是。

黃 勇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

---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八期 2006年3月31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八期（2006年3月31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